

第一屆

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

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日本東方學會編
大東文化大學



第一屆

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

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日本東方學會
大東文化大學 編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大東文化大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04-8642-8

I. ①第… II. ①中… III. ①中國—古代史—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4290 號

責任編輯 李炳青

責任校對 王應來

封面設計 回歸線視覺傳達

技術編輯 張漢林

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電 話 010-84029450 (郵購)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29.5 插 頁 2

字 數 482 千字

定 價 62.00 圓

前 言

中日兩國中國古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源遠流長，當然在不同歷史階段，交流的範圍、深度、廣度及交流方式各有不同。很多年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與中日兩國學者密切的學術交流分不開。無論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哪一個方面的學者，我想都應該深有體會！

2006 年前後，歷史所醞釀着如何在 21 世紀進一步推動中日兩國這種交流的加深。在前所長陳祖武先生、副所長劉榮軍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科研處齊克琛、樓勁先生的具體負責下，這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2007 年底，歷史所所務會決定委派正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做訪問研究的本所王啓發先生通過大東文化大學教授、東方學會東京支部長兼常務理事池田知久先生，與日本著名的學術團體東方學會進行聯繫和溝通，就共同舉辦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並在中國、日本輪流召開，以及長期合作等諸多事宜進行協商，此建議得到東方學會會長池田溫、理事長戶川芳郎先生以及東方學會理事會的積極支持。

2008 年 1 月，歷史所方面起草了論壇規劃方案並與東方學會方面溝通。2 月，歷史所所務會通過了論壇合作方案，提交給東方學會理事會商討確定。4 月，歷史所就首屆論壇的主題擬為“史料與中國古代史研究”和論壇舉辦時間擬於 2009 年 8 月等事宜與東方學會方面商討。2008 年 5 月，歷史所擬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日本東方學會關於共同舉辦首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的合作大綱》並提交給日本東方學會商討。6 月，歷史所向東方學會寄送由歷史所所長陳祖武簽字的《合作大綱》一式兩份，由東方學會會長池田溫先生簽字後

寄回歷史所一份。至此，雙方最終達成了在 2009 年 8 月中旬在中國北京舉辦首屆論壇的書面協議。同時還就雙方 5 年期的合作協議作了進一步的商討。2008 年 8 月，雙方就擬定參加首屆論壇的中日學者人選及相關信息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2009 年 4 月，雙方就以 5 年為期限和輪流主辦“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協議的具體文本內容進行商談。6 月，歷史所將雙方共同商定的協議中文版發給池田知久先生轉交日本東方學會。至此，協議文本已經完全確定下來了，即由歷史所負責打印製作中文本，東方學會負責打印製作日文本，簽約時間定於首屆論壇召開期間。與此同時，歷史所向中日學者寄送“首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會議邀請函，確定論壇會議於 2009 年 8 月 12 日到 13 日在北京舉行。8 月 11 日下午，東方學會會長池田溫先生與歷史所副所長劉榮軍先生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日本東方學會 關於共同舉辦“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的協議》中文本和日文本上簽字。中方參加簽字儀式的代表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所研究員、前所長陳祖武，副所長卜憲群、王震中，科研處處長齊克琛、副處長樓勁、研究員王啓發（兼翻譯）；日方參加簽字儀式的代表還有東方學會理事長戶川芳郎、事務局局長河口英雄、東京支部長池田知久、大東文化大學教授渡邊義浩、早稻田大學副教授河野貴美子（任翻譯）。8 月 12 日上午首屆論壇會議如期召開，並圓滿結束。首屆論壇得到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的大力支持，承擔了不少組織工作和日方部分學者的費用，故也是此次論壇的主辦方之一。在歷史所和東方學會之外吸收第三方參與，共同主辦這個論壇的模式是一個好方法，還將繼續下去。

“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是為中日兩國全體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搭建的一個學術交流平臺，參加者並不限於某一個機構。這個平臺的建立是中日兩國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誠摯地感謝為搭建這個平臺作出貢獻的各方人士。我們也相信論壇能夠持續的辦下去，並且越辦越好！

《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就要出版了，論壇辦得好不好，《文集》水平的高低是一個檢驗，是一個代表，相信讀者自會有評論。樓勁先生囑我寫個前言，以我的學識很難對《文集》中的各位先生，特別是其中中日兩國很多德高望重的學者的大作作出評

論，而《文集》中又正好缺少對本次會議情況的說明，故我就把這次論壇舉辦的前前後後情況作一簡要介紹，也算是為這段歷史過程留下一個見證吧！

2010年2月4日卜憲群謹識於北京

目 錄

前言	(1)
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與東方學會(發言摘要)	池田温(1)
「儒藏」日本編纂委員會的活動について(發言摘要)	戸川芳郎(3)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都城史研究	
——以漢長安城遺址考古發現爲例	劉慶柱(5)
依據出土資料展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以上博楚簡《周易》敏(姤)卦爲例	池田知久(17)
讀清華簡札記	
——中道之實踐與權變	李均明(65)
戦国楚簡を通して見た先秦道家	
——上博簡(七)『凡物流形』を中心に	谷中信一(71)
戦國、秦代出土史料與《史記》	藤田勝久(98)
附録 1	(130)
附録 2	(133)
秦漢田律考	
——以與習俗的關聯爲主	工藤元男(135)
石泉學派歷史地理體系對出土資料解讀的挑戰:	
以里耶秦簡地名爲例	吳 銳(153)
漢代“西域”史料的發現和理解	王子今(175)
也談董仲舒上言“又加”句的解讀問題	陳 偉(190)

- 從漢簡材料看漢晉時期絲綢之路全程的走向和路綫 …… 張德芳(196)
- “史”的自立
- 以魏晉時期“別傳”的流行爲中心 …… 渡邊義浩(212)
- 北魏蓋天保墓磚透露的歷史信息 …… 李 凭(229)
- 《天聖令》在唐宋史研究中的價值
- 以現有研究成果爲中心 …… 黃正建(243)
- 從天聖《喪葬令》的職官標準看唐宋社會之變遷 …… 吳麗娛(260)
- 『朱子語類』の記録について
- 口頭語と書かれた白話の關係 …… 垣内景子(280)
- 從碑刻材料看金元全真教徒的修煉生活 …… 張廣保(288)
- 《青海衛拉特聯盟法典》“後記”翻譯及注釋 …… 青格力(313)
- 明清地方文書檔案遺存述略 …… 樂成顯(325)
- 明代詔令文書的整理與明史研究 …… 萬 明(351)
- 《皇明通紀輯要》在朝鮮的流傳與重編 …… 楊艷秋(363)
- 天一閣藏《明史稿·鄒來學傳》校讀 …… 陳時龍(384)
- 從族譜資料看清初鄭成功政權的抗清活動 …… 陳支平(402)
- 雍正帝自稱“漢子”
- 解讀一條史料 …… 馮爾康(415)
- 滿文密摺所見誠親王允祉與雍正帝胤禛
- 兼論雍正帝“屠弟”問題 …… 楊 珍(429)
- 清宮檔案與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 吳伯姪(451)

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與東方學會

(發言摘要)

日本東方學會會長 池田溫

日本古來繼續攝取東亞大陸之漢文明，於歷史學蒙漢唐學術傳統的影響深厚。古代之《六國史》和近世之《本朝通鑑》、《大日本史》都用漢文撰寫。明治維新以降直接學習歐美近代史學，招聘 RANKE 的弟子 Ludwig RIESS (1861—1928) 於東京大學講授萬國史和史學研究法。亦努力翻譯泰西歷史書，設立修史機構。

那珂通世 (NAKA Michiyo, 1851—1908) 創唱“東洋史”，於中等教育以日本史 (國史)、東洋史 (亞洲史，但以中國史為主)、西洋史之三教科為基本。教科書和學會組織俱以三史鼎立為常態。

近代日本之代表的東洋史家羅列如下：

那珂之外、白鳥庫吉 (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內藤湖南 (NAITŌ Konan, 1866—1934)、津田左右吉 (TSUDA Saukichī, 1873—1961)、池內宏 (IKEUCHI Hiroshi, 1878—1952)、加藤繁 (KATŌ Shigeshi, 1880—1946)、羽田亨 (HANEDA Tōru, 1882—1955)、和田清 (WADA Sei, 1890—1963)、石田幹之助 (ISHIDA Miki-nosuke, 1891—1974)、宮崎市定 (MIYAZAKI Ichisada, 1901—1995)、松田壽男 (MATSUDA Hisao, 1903—1982)、貝塚茂樹 (KAIZUKA Shigeki, 1904—1987)、鈴木俊 (SUZUKI Shun, 1904—1975)、末松保和 (SUEMATSU Yasukazu, 1904—1992)、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1906—2002)、森鹿三 (MORI Shikazō, 1906—1980)、周藤吉之

(SUTŌ Yoshiyuki, 1907—1990)、三上次男 (MIKAMI Tsugio, 1907—1987)、日野開三郎 (HINO Kaizaburō, 1908—1989)、旗田巍 (HATA-DA Takashi, 1908—1994)、山本達郎 (YAMAMOTO Tatsuro, 1910—2001)、中嶋敏 (NAKAJIMA Satoshi, 1910—2007)、佐伯富 (SAEKI Tomi, 1910—2006)、榎一雄 (ENOKI Kazuo, 1913—1989)、守屋美都雄 (MORIYA Mitsuo, 1915—1966)、三笠宮崇仁 (MIKASANOMIYA Takahiro, 1915—)、島田虔次 (SHIMADA Kenji, 1917—2000)、西嶋定生 (NISHIJIMA Sadao, 1919—1998)、護雅夫 (MORI Masao, 1921—1996)、神田信夫 (KANDA Nobuo, 1921—2003) 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降伏後，東洋史研究者們深刻地反省了從來的日本中心主義和對外侵略，而對外交易、交流急速發展，東洋史研究領域擴大，對近東（西南亞）、南亞、東南亞的歷史研究漸漸充實起來。

東方學會於1947年創立，初代會長是羽田亨，其目的即推進亞洲全域的人文、社會諸科學之振興和國際學術交流。現在會員大約千五百餘名。主要刊物《東方學》（半年刊）、《ACTA ASIATICA》（半年刊）、會報（半年刊）、日本學關係文獻目錄等。每年春秋兩回舉辦研究集會 Symposia。會員中專攻中國文學、中國思想者比較多，然而史學、宗教、藝術研究者亦不少。研究集會往往聘請海外同仁參加，是國際交流的良好管道。

「儒藏」日本編纂委員會の活動 について(發言摘要)

日本東方学会理事長、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戸川芳郎

「儒藏」日本編纂委員會は、中國における國家的プロジェクト「儒藏」編纂事業の、日本におけるその編纂工作の主體である。

「儒藏」編纂事業とは、統括者：北京大学 湯一介教授のもと、北京大学ほか中国の約 26 の大学、研究機關が連携しつつ進めている、儒家關係テキストを纂集し編刊する一大工作である。

いわば仏典の大正大藏經や道教文献の明正統道藏の、IT 情報システムに乗るに耐える、現時のその活用状況に倣って、儒學典籍においても網羅的に集成して、この情報システムに組み込もうとする一大企画の、その事業である。

従って、實用の利便性をねらうテキストの作制が、企画の狙いの一つであった。

そして、その版圖は、儒教文化の及ぶかぎりの地域、漢字文化圏——朝鮮半島、わが列島、琉球、ベトナムに及ぶ。

これに応じた日本の工作主體——「儒藏」日本編纂委員會は、2006（平成 18）年 10 月、日本中國學會大會（大東文化大學）で立ち上げられた。

○「儒藏」日本編纂委員會（◎同實行委員）

〔顧問〕石川忠久、興膳 宏、戸川芳郎

〔委員〕池田秀三、池田知久、市來津由彦、稲畑耕一郎、家井

真、◎大島 晃、金文京、◎河野貴美子、小島 毅、佐藤 進、佐藤 保、佐藤鍊太郎、土田健次郎、◎長尾直茂、橋本秀美、◎町 泉壽郎、松川健二、湯淺邦弘

日本側の工作作業として、文獻、底本の選定と校點、校勘、標點、分段等のテキスト作成にかかわる作業を負担し、その組版、印刷、製本等の編刊作業は、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が負担すること。この原則のもと、第一回委員會で、儒學典籍の精華編と大全編に該当する、日本の漢文體で撰述された文獻の。

○著者 ○著述 ○校訂、解題執筆者

が提示され、各委員に分擔作業が依頼された。

第二回編纂委員會 2007（平成 19）年 10 月 於：日本中國學會大會（名古屋大）

「執筆要項」

第三回編纂委員會 2008（平成 20）年 10 月 於：日本中國學會大會（京都大）

「儒藏」日本版 編次（16 卷）

これらの編纂委員會を通して、各分担チームごとに編纂工作は進行中である。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都城史研究

——以漢長安城遺址考古發現爲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劉慶柱

一 關於中國古代都城史研究的學術定位問題

在世界古代歷史上，存在着許許多多古代都城，但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都城數量之多、歷史延續之完整、文化內涵之豐富，尤爲突出。據有的學者統計：“內地各省市共有 15 年以上的古都 53 處，涉及的王朝或政權 172 個；不足 15 年的古都計有 79 處，涉及的政權 90 個；未知具體年代的古都 2 處，涉及的政權 4 個；另外還應該添上夏、商兩代的都城和周的先世都城 30 處。幾宗合計：共有古都 164 處，涉及的王朝或政權 269 個。周邊各省區，可知有具體年代的古都 6 處，涉及的政權 8 個；未知具體年代的古都 47 處，涉及的政權難以確知，共有古都 53 處。內地與周邊各地合計，共有古都 217 處，可知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權 277 個。”上述古都年代不包括“遠古傳說”，而以“三代”爲始至明清王朝，其時代延續近 4000 年之久。^①

由於王朝的更迭、都城的興建是歷代統治者的“國之大事”，因此關於都城建設與古代都城史研究歷來爲官方與學術界所重視。20 世紀

^① 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52、164 頁。

80年代初，國家推出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及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興起的世界文化遺產事業熱潮，作為重要文化遺產的古代都城越來越備受社會關注，關於古代都城的歷史學、考古學研究越來越“升溫”。

作為歷史學、考古學的古代都城研究，有的學者提出：“中國古都學是研究我國古都的形成、發展、蕭條或至於消失，或經過改革成為新的城市的科學。”^① 長期以來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與建築技術作為其主要學術研究內容。當然，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階段或前期是學科發展過程中必要與必須的，但是隨着古代都城史研究的深入，只是將古代都城研究定位於這樣的目標上，顯然是無法完成古代都城史研究的主要學術目的。上述關於古代都城史研究定位，只能說是通往古代都城研究目的的技術路徑、方法，還不能說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終極目標。中國古代都城作為古代國家歷史的縮影，它們是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軍事指揮中心。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研究都城是力圖通過古代都城這樣一座集政治統治、經濟管理、文化禮儀活動、軍事指揮於一體的都城歷史活動平臺，探索它們所折射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禮儀活動方面的重大歷史，這應該是歷史學、考古學關於中國古代都城研究的學術定位。

二 古代都城研究與古代都城田野考古

考古學與歷史學，二者學術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它們都是研究與人相關“歷史”的科學。但是二者又有顯著的區別，考古學與歷史學的主要區別，一是研究對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學以人類或與人類相關的物化載體（包括人類生存自然環境）為基本研究對象，其基本方法是藉助於生物學的類型學與地質學的層位學及其他自然科學技術，解決研究對象的“時空”問題及物質載體的結構、變化所反映的“歷史”問題（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考古學又更多地利用碳十三、分子生物學、環境科學等其他相關自然科學技術，提取更多、更深

^① 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的》，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3頁。

層次的科學信息，探討人的關係、社會問題等）。

古代都城遺址考古研究離不開歷史文獻，但是古代都城遺址考古不能停留於這樣的研究層面，上述層面的內涵可以為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都城時代、地望等基本的時空框架，具體的時代、地望細化與確認，需要田野考古的新材料及考古學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先秦時代的夏、商兩代都城，歷史文獻記載各有 13 座都城之多，然而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之之前，夏商王朝都城具體在什麼地方、其都城形制與文化內涵等均不了解。1928 年開始的安陽殷墟考古發掘，揭開了商代都城面紗。^① 但是，當時只是能夠認識到商代晚期都城的一些情況，至於“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城，還是通過 20 世紀 50—80 年代的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考古勘探、發掘得以確認的。^② 夏代都城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考古發現之前，實際上是僅僅從文獻記載上知道一些夏代都城的名字，都城的地望雖有記載，但是說法頗多，有的甚至相距頗遠。20 世紀後半葉田野考古發現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尤其是 21 世紀之初二里頭遺址的宮城遺址及其中多座宮廟建築遺址發掘、宮城周圍道路網的發現、祭祀

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 年）、第二期（1930 年）、第三期（1931 年）、第四期（1933 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殷墟建築遺存》，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59 年版；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一，北組墓葬》（上、下冊），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0 年版；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二，中組墓葬》，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2 年版；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3 年版；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四，乙區基址上下的墓葬》，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6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001 號大墓》（上、下冊），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62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002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65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003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67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004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0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217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68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500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4 年版；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550 號大墓》，史語所出版，臺灣臺北，1976 年版；《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杜金鵬、王學榮主編：《偃師商城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區、玉石和青銅作坊區遺址的究明，使學術界對夏王朝晚期都城的具體地望、時代、形制與文化內涵等有了認識，對其作為夏代晚期都城遺址取得了基本上的共識。^①

歷史文獻在古代都城記載方面往往顯得過於簡略、粗疏甚至有遺漏，缺少必要的“量化”。長期以來在古代都城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問題，如有些古代都城研究中，以一些簡略記載甚或“假設”為基礎，進行“推斷”，從“假設”再到“假設”，從而得出一些與實際大相徑庭的結論。比如，在漢長安城布局形制研究中，有的學者根據自己對文獻記載的理解，認為漢長安城有“北郭”和“東郭”，並認定“當時北面和東北面郭區是主要居民區和市區所在，成為很重要的經濟中心，這和長安城內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正好相互配合”。^②由此進一步推斷：從東周至西漢時代都城“西城與東郭的連接佈局結構”。這個問題涉及了都城布局形制的重大問題。漢長安城遺址的田野考古證實，西漢時代的漢長安城北城牆與渭河之間南北相距僅有1200米，其間建築遺址發現甚少，在北城牆之外的今曹家堡、張道口等村莊都發現了漢墓群；漢長安城遺址東部的所謂“東郭”地帶，“根據《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及近年來考古發掘公佈的資料，初步統計長安城周圍的漢代墓葬群及漢墓發掘地點約有300多處，除帝王陵及大型陪葬墓分佈在較遠的咸陽原、杜陵原、霸陵原之上外，大多數中小型墓葬主要分佈在長安城東、東南的坡樑或臺地之上”^③。由此可見，前述所謂漢長安城的“東郭”，實際上應為市民墓地，^④漢長安城東部和北部不是什麼東郭與北郭，那裏更不可能是都城的“主要居民區和市區所在”及“很重要的經濟中心”。由此推斷的從東周至西漢時代都城“西城與東郭的連接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杜金鵬、許宏主編：《偃師二里頭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8頁。

③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鄭州大學考古專業：《長安漢墓》（上冊），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④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龍首原漢墓》（甲篇）：“在漢長安城東北、城東，特別是城東南的龍首原上，比較密集的西漢墓群，則屢有發現……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是當時京城一般居民最主要的墓葬區。”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佈局結構”是不能成立的。

現在一些從事古代都城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新資料，但是由於對考古資料理解的不同，往往也造成研究中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在關於秦咸陽城研究中，有的學者認為：“咸陽南靠渭水。因為渭水不斷北移，故城遺址受到沖決，目前已看不到城址蹤迹。”於是提出：“秦都咸陽的佈局，既然由於遺址的被沖決，無法用考古方法來查明，那麼，只有依據文獻及其他考古資料來探索了。根據文獻記載，秦惠王滅蜀以後，命令張儀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陽國都的格局建築的，因此我們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來推斷咸陽的佈局了。”^①其實秦都咸陽遺址的考古工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已經開展，70年代至80年代又對秦咸陽宮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宮殿建築遺址等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勘探、試掘確認了咸陽宮宮城城牆，出土了大量戰國時代晚期和秦代的龍紋空心磚、動物紋與雲紋瓦當建築材料、壁畫殘塊等遺物，在秦咸陽城西南部又發現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秦詔版”等遺物，^②在都城遺址以西發掘了3處規模很大的秦墓區。^③對於這些田野考古資料未能深入全面系統研究；而是以《華陽國志》記載成都“與咸陽同制”，進而得出咸陽城“西城連接東郭”的結論。我認為這樣的論證不够嚴謹，如果能夠以秦咸陽城遺址多年來的大量考古發現資料為基礎，開展對秦咸陽城遺址研究，其結論的科學性可能會更好一些。

①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頁。

②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秦都咸陽古城遺址的調查和試掘》，《考古》1962年第6期；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勘查小組：《秦都咸陽古城遺址發掘的窑址和銅器》，《考古》1974年第1期；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年第11期；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市博物館、咸陽地區文管會：《秦都咸陽第三號宮殿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咸陽宮第二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陳國英：《咸陽長陵車站一帶考古調查》，《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陽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③ 秦都咸陽考古隊：《咸陽市黃家溝戰國墓葬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2期；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兒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陽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嘴秦墓》，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